

会计制度强制变迁对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黄文,王晶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我国 2001 年和 2007 年实施了两次强制性的会计准则改革,而会计准则的变迁可能会影响到会计稳健性的程度。本文使用 1999—2007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在样本期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存在会计非条件稳健性;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不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2001 年的会计制度变更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水平,但 2007 年的会计制度的变更是否降低了非条件稳健性的水平则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会计制度变迁;非条件稳健性;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3-0118-05

一、引言

Basu(1997)指出稳健性原则影响会计实务至少已有五百年了。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稳健性原则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会计核算原则,并且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具有深远和重要的影响。在国外学术界,很多学者也给出了自己对稳健性的定义。Basu(1997)把稳健性定义为:对好消息(利得)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损失)的确认要求有更加严格的证据。Basu(1997)对稳健性的定义使我们可以度量稳健性的程度:对好消息(利得)和对坏消息(损失)确认要求的不对称的程度越大,稳健性的程度越大。Beaver & Ryan(2005)认为稳健性是指相对于市场价值,账面价值对公司净资产的低估。

近几年来,学术界把稳健性分为条件稳健性(Conditional Conservatism)和非条件稳健性(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非条件稳健性又被称为资产负债表稳健性、事前稳健性、独立于信息的稳健性,这种稳健性是在消息出现之前就采取的稳健措施,它使会计信息系统对未来的坏消息具有免疫性。例如:历史成本法、对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对研发支出的费用化处理等等。条件稳健性又被称为盈余稳健性、事后稳健性、依赖于信息的稳健性,是指对好消息(利得)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损失)的确认要求有更加严格的证据(Basu,1997)。例如,计提资产的减值准备、存货计价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等。由上述对稳健性分类

可以得出,Basu(1997)定义的稳健性仅仅指的是条件的稳健性,而 Beaver & Ryan(2005)定义的稳健性不仅包括了条件稳健性而且包括了非条件的稳健性。目前,国内的学者对条件稳健性的研究比较多,而对非条件稳健性的研究较少。

Watts(2003)对学术界在会计稳健性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认为稳健性存在于会计实务中有四个重要的解释,分别为契约(contracting)、诉讼(litigation)、会计管制(regulation)和税收(taxation)。我国近年来连续几次会计制度的变迁为本文研究会计管制对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提供了机会。自从 21 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大体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会计制度改革,分别为 2001 年和 2007 年的改革。而这两次改革势必会对非条件稳健性产生影响。

2001 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的很多处改动都会提高上市公司非条件稳健性的水平,例如,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根据科技发展、环境及其他因素,选择合理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鼓励加速折旧法的使用。还规定,除购建固定资产以外,所有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开办费),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2007 年会计制度改革改变了主要以强化稳健性原则运用的思路,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使用范围。例如,过去自创的无形资产,在创造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全部予以费用化。新会计

准则把无形资产的创造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一个是开发阶段。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期末结转;在开发阶段,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允许资本化,在期末并不结转,而是在开发成功以后,转入无形资产账户。旧会计准则中将企业接受的捐赠计入资本公积是一种过度稳健的做法,新准则将其计入营业外收入则体现了适度稳健的思想,即承认这是一项偶发性的利得,应计入当期损益,这也符合当前国际惯例。上述例举的两处改动会降低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水平。

本文以 Qiang (2007) 的模型为基础进行简化,用简化过的模型来度量非条件稳健性。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样本是 1999 年至 2007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A 股上市公司,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主要检验了 1999—2007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系统中是否存在非条件稳健性,并检验了我国 2001 年和 2007 年两次会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分别对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 1999—2007 年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会计中存在非条件稳健性;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不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2001 年的会计制度变更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水平;至于 2007 年的会计制度的变更是否降低了非条件稳健性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有关稳健性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实证结果以及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Beaver & Ryan(2005)指出稳健性可以是非条件的(事前的或独立于信息的),也可以是条件的(事后的或依赖于信息的)。他们认为稳健性是指相对于市场价值,账面价值对净资产的低估。Beaver & Ryan(2005)对稳健性的定义不仅包含了条件的稳健性而且包括了非条件的稳健性,这也是本文所采纳的定义。Watts(2003a)认为,稳健性主要是应契约、诉讼、会计管制和税收的要求而产生的。其中,契约和诉讼可能是稳健性的两个最重要的解释。会计管制作为对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解释,国外的很多文献对此进行研究。

Barth et al.(2006)通过比较 1990 年到 2004 年间应用国际会计准则公司和相匹配的美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发现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在盈余管理、及时确认损失(条件稳健性)以及价值相关性方面,都比应用美国会计准则的公司要差。Lo-

bo et al.(2006)使用 Basu(1997)的模型研究证明,由于 SEC 要求上市公司的 CEO 和 CFO 保证其公布的财务报告“在所有重要方面是准确和完整的”,在萨班斯法案实施后的两年里,财务报告中条件稳健性的程度更大了。Qiang(2007)运用美国 1982—2002 年的数据发现管制导致非条件稳健性的产生。Barth et al.(2008)比较了 21 个国家从应用本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转为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质量的变化。结果发现公司应用了国际会计准则后会计报表有较少的盈余管理,更及时的损失确认(条件稳健性),更高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以及较低的资本成本,应用国际会计准则带来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在国内学术界,研究会计管制对条件稳健性影响的文章比较多,例如,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吴东辉、陈世敏(2007)和贾瑞芳(2008)。但是,对非条件稳健性的研究还是不足。本文主要是对非条件稳健性进行研究,这也是本文的最重要的贡献。

Hanna(2002)认为 Basu(1997)的研究结果是由于管理层盈余管理造成的。García Lara et al.(2005)研究了盈余管理对条件稳健性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可操控性应计项目之后,法国和德国的条件稳健性特征显著降低。但是, Hanna(2002)提出的盈余管理的解释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以及李远鹏(2006)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条件稳健性及上市公司整体的条件稳健性的研究发现,很多研究得出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条件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而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那么,上市公司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是否也受亏损公司“洗大澡”行为的影响呢?本文就对此一问题进行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Beaver & Ryan(2000)认为账面市值比(book-to-market ratio)的变动来源于两个方面——偏差(the bias in book value)和滞后(the lags in book value)。偏差(the bias in book value)指的是账面价值持久性的高于(低于)市场价值,这就会导致账面市值比(book-to-market ratio)持久性的大于(小于)1。滞后(the lags in book value)指的是未预期到的利得(损失)不能及时的被确认到账面价值中,这就会导致账面市值比(book-to-market ratio)暂时性的大于(小于)一个值(1减去偏差(the bias in book value))。其中,偏差就是我们要度量的非条件的稳健性;好消息和坏消息不对称的滞后性指的就是条件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Qiang(2007)来度量非条件的稳健性,模型如下:

$$BTM_{it} = \alpha_1 + \alpha_i + \sum_{j=0}^6 [\beta_j^1 RET_{it-j} + \beta_j^2 DR_{it-j}] + \mu_{it};$$

$$CVS_t^u = 1 - \hat{\alpha}_t$$

其中, BTM_{it} 是指公司 i 在 t 年末的账面市值比。 DR_{it-j}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 i 在 $t-j$ 年的市场回报率为负, 则 $DR_{it-j} = 1$; 否则, $DR_{it-j} = 0$; RET_{it-j} 是指公司 i 在 $t-j$ 年的市场回报率, $j = 0, 1, 2, 3, 4, 5, 6$; CVS_t^u 度量的是 t 年所有样本公司平均的非条件稳健性。 μ_{it} 为残差项。

在本模型 (1) 中, 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回归方法计算出的每家公司的截距 (firm intercepts) α_i 捕捉的是公司 i 在样本期间的平均偏差 (the bias)。 时间效应 (time effects) 回归方法计算出的每年的截距 (time intercepts) α_t 捕捉的是 t 年所有公司的平均偏差 (the bias)。 $\sum_{j=0}^6 [\beta_j^1 RET_{it-j} + \beta_j^2 DR_{it-j} * RET_{it-j}]$ 捕捉了不对称的滞后性。 预期 α_t 小于 1, 因为 $CSV_t^u = 1 - \alpha_t$, 如果非条件的稳健性是存在的, 即 $CSV_t^u > 0$, 所以 α_t 小于 1。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加入虚拟变量 D_1 和 D_2 , 得到模型 (2), 用来检验会计制度的变迁对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 模型 (2) 如下:

$$BTM_{it} = \alpha_t + \beta_1^0 D_1 + \beta_2^0 D_2 + \sum_{j=0}^6 [\beta_j^1 RET_{it-j} + \beta_j^2 DR_{it-j} * RET_{it-j}] + \mu_{it}$$

其中, BTM_{it} 是指公司 i 在 t 年末的账面市值比 (book-to-market ratio)。 DR_{it-j}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 i 在 $t-j$ 年的市场回报率为负, 则 $DR_{it-j} = 1$; 否则, $DR_{it-j} = 0$ 。 RET_{it-j} 是指公司 i 在 $t-j$ 年的市场回报率, $j = 0, 1, 2, 3, 4, 5, 6$ 。 CVS_t^u 度量的是公司 i 在样本期间内平均的非条件稳健性。 D_1 为时间虚拟变量, 如果 $t \geq 2001$, 则 $D_1 = 1$; 否则, $D_1 = 0$ 。 D_2 为时间虚拟变量, 如果 $t \geq 2007$, 则 $D_2 = 1$; 否则, $D_2 = 0$ 。 μ_{it} 为残差项。

在模型 (2) 中, 如果 β_1^0 的符号为负, 那么表明 2001 年会计制度的变迁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 如果 β_1^0 的符号为正, 那么就表明 2001 年会计制度的变迁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 同理, 如果 β_2^0 的符号为负, 那么表明 2007 年会计制度的变迁相对于 2001—2006 年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 如果 β_2^0 的符号为正, 那么就表明 2007 年会计制度的变迁相对于 2001—2006 年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

(二) 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1993—2007 年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A 股上市公司。 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 (2009 年版)。 其中, 1993—1998 年为估计期 (estimation period), 1999—2007 年为样本期 (sample period)。 样本剔

除了金融、保险类的公司。

在回归模型 (1) 和模型 (2) 时, 剔除了账面净资产为负的公司; 剔除了账面净资产、净资产市值以及年市场回报率 (RET) 任何一个变量有缺失的观测值; 分年度剔除了 BTM 以及 RET 排名在前 1% 和后 1% 的观测值; 由于模型 (1)、(2) 需要计算 RET_{it} 滞后 6 期的值, 因此, 剔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后连续上市纪录小于 7 年的公司。 最终有 753 家公司满足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要求, 总共得到 3 650 个观测值 (firm-years)。 由于剔除了连续上市纪录小于 7 年的公司, 样本可能会存在生存偏差。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描述的是模型 (1) 和模型 (2) 所使用变量的统计属性, 包括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和偏度。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偏度
BVE(亿元)	3650	15.32	61.67	0.27	8.77	3263.47	42.13
MVE(亿元)	3650	46.33	287.72	1.99	20.90	16382.71	50.77
BTM	3650	0.47	0.29	0.04	0.40	1.76	0.96
RET	3650	0.54	1.03	-0.65	0.12	6.34	1.71

BVE (book value of equity) 和 MV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的均值要远远大于中位数, 偏度 (分别为 42.13 和 50.77) 要远远大于 0。 表明, 在样本公司中, 大部分公司的规模要小于均值, 而小部分公司的规模非常大, 由于这些少数大规模公司的影响, 使得均值要大于中位数。 BTM (book to market value) 的偏度要远远小于 BVE 和 MVE, 比较接近于正态分布。 个股的年市场回报率 (RET) 的均值为 0.54, 偏度为 1.71, 概率分布属于正偏厚尾型的, 比较符合个股市场回报率概率分布的一般规律。

(二) 回归结果

对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见表 2 所示, 在未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的回归中, 截距和年个股市场回报率 (RET) 解释了 BTM (book to market) 变化的 83.24%。 1999—2007 年各年度的最小方差均值分别为 0.594、0.593、0.638、0.658、0.611、0.495、0.370、0.449 和 0.560,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不等于 0。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1999—2007 年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是存在非条件稳健性的。 但是, 由于模型 (1) 的回归样本中剔除了连续上市纪录小于 7 年的公司, 样本可能会存在生存偏差, 回归结果有可能不能代表整体上市公司。

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条件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 而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

那么,样本公司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是否也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呢?为了研究亏损公司的“洗大澡”行为对上述所得到的研究结果的影响,笔者从样本中剔除了具有“洗大澡”动机的亏损公司观测值。与 Riedl(2004)的做法一致,笔者把当年 ROA(净利润除以总资产)为正的公 司定义为盈利公司,把当年 ROA 为负的公司定义为亏损公司,把“洗大澡”的公司定义为 ROA 小于当年亏损公司 ROA 的中位数的公司。剔除掉 192 个“洗大澡”的亏损公司观测值后,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 2。

剔除了“洗大澡”亏损公司观测后的回归中,截距和年个股市场回报率(RET)解释了 BTM(book to market)变化的 83.69%。1999—2007 年各年度的最小方差均值分别为 0.595、0.586、0.635、0.662、0.620、0.504、0.372 和 0.449,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不等于 0,即剔除了“洗大澡”的亏损公司后,1999—2007 年剩余样本公司中会计的非条件稳健性是存在的,这就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不是亏损公司“洗大澡”行为造成的假象。

表 2 非条件稳健性(CVS)存在性检验结果

BTM	未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		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后	
	变量回归系数	t 值	变量回归系数	t 值
α_i 的均值	0.422***	4.43	0.413***	4.35
α_i 的均值	-0.027	0.16	-0.027	-0.16
RET _t	-0.098***	-23.84	-0.102***	-24.84
RET _{t-1}	-0.063***	-9.21	-0.064***	-9.55
RET _{t-2}	-0.072***	-6.40	-0.077***	-6.90
RET _{t-3}	-0.040***	-4.79	-0.042***	-5.13
RET _{t-4}	-0.040***	-5.81	-0.039***	-5.77
RET _{t-5}	-0.036***	-5.43	-0.056***	-5.46
RET _{t-6}	-4.8E-6	-0.002	-2E-4	-0.11
DR _t * RET _t	-0.366***	-14.87	-0.397***	-15.75
DR _{t-1} * RET _{t-1}	-0.284***	-11.48	-0.092***	-3.43
DR _{t-2} * RET _{t-2}	-0.069**	-2.58	-0.086***	-3.34
DR _{t-3} * RET _{t-3}	-0.076**	-2.96	-0.097**	-2.89
DR _{t-4} * RET _{t-4}	-0.122***	-4.53	-0.134***	-4.98
DR _{t-5} * RET _{t-5}	-0.030	-1.09	-0.042	-1.53
DR _{t-6} * RET _{t-6}	-0.083***	-3.35	-0.093***	-3.78
N	3650		3458	
Adj. R ² (%)	83.24		83.69	

注:***双尾 1%水平上显著 **双尾 5%水平上显著 *双尾 10%水平上显著

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的回归方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目的是为了分别检验我国 2001 年和 2007 年的会计制度改革是否影响了上市公司会计的非条件稳健性。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会计制度变迁对非条件稳健性(CVS)的影响分析

BTM	未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		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后	
	变量回归系数	t 值	变量回归系数	t 值
α_i 的均值	0.392**	2.09	0.387**	2.07
D ₁	-0.057***	-4.80	-0.062***	-5.23
D ₂	-0.077***	-6.47	-0.074***	-6.20
RET _t	-0.102***	-24.26	-0.104***	-24.65
RET _{t-1}	-0.071***	-10.00	-0.070***	-9.92
RET _{t-2}	-0.136***	-12.99	-0.140***	-13.37
RET _{t-3}	-0.107***	-13.33	-0.111***	-13.88
RET _{t-4}	-0.075***	-10.64	-0.078***	-11.20
RET _{t-5}	-0.045***	-6.93	-0.046***	-6.94
RET _{t-6}	-0.012***	-5.18	-0.013***	-5.38
DR _t * RET _t	-0.502***	-19.66	-0.530***	-19.99
DR _{t-1} * RET _{t-1}	-0.439***	-17.23	-0.476***	-18.37
DR _{t-2} * RET _{t-2}	-0.174***	-6.15	0.189***	-6.62
DR _{t-3} * RET _{t-3}	-0.277***	-10.73	-0.284***	-10.93
DR _{t-4} * RET _{t-4}	-0.37***	-14.07	-0.385***	-14.52
DR _{t-5} * RET _{t-5}	-0.092***	-3.28	-0.115***	-4.04
DR _{t-6} * RET _{t-6}	-0.115***	-4.3	-0.126***	-4.69
N	3650		3458	
Adj. R ² (%)	78.98		79.96	

注:***双尾 1%水平上显著 **双尾 5%水平上显著 *双尾 10%水平上显著

在表 3 未剔除“洗大澡”亏损公司的回归中,截距和年个股市场回报率(RET)解释了 BTM(book to market)变化的 78.98%。平均的公司层面的截距(firm effects)为 0.392,表明在平均意义上,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对净资产市值的低估(1-BTM)包含了(1-0.392)的持续性偏差,即非条件稳健性。虚拟变量 D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2001 年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虚拟变量 D₂的回归系数为负,似乎表明 2007 年会计制度的变迁相对于 2001—2006 年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但是,基于 BTM 模型度量的非条件稳健性是指相对于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账面价值对净资产的持续低估。当股票市场繁荣的时候,公司的市场价值就容易被高估。相比公司的真实价值,被高估出来的那部分价值就被计入到非

条件稳健性(CVS^u)当中了,因此,非条件稳健性就会被高估。当股票市场低迷的时候,公司的市场价值就容易被低估。相对于公司的真实价值,被低估的那部分价值就没有被计入到非条件稳健性(CVS^u)当中,因此,非条件稳健性就会被低估。

从1999—2007年,我国的股票市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99—2000年的繁荣阶段,2001—2005年的低迷阶段和2006—2007年的泡沫阶段。2001年的股票市场处于低迷期,相比1999年和2000年,2001年的非条件稳健性(CVS^u)会被低估,但实证结果却发现2001年的非条件稳健性(CVS^u)比1999年的和2000年的都要高。因此,剔除了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2001年会计制度的变迁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系统的非条件稳健性水平。2002年至2005年,非条件稳健性(CVS^u)的逐年下降可能是受到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影响。2007年,我国股票市场处于泡沫时期,这期间的非条件稳健性(CVS^u)会被高估。由于受到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影响,2007年的会计制度变迁并不一定真正地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的水平。那么,2007年的会计制度的变更如何影响了上市公司会计的非条件稳健性呢?对这一问题的证明还需要分析2007年以后的数据,但在本论文撰写期间,不能从CSMAR数据库得到这些数据。

表3所示,剔除了“洗大澡”的亏损公司观测值后,所得到的实证结果与剔除前的基本一致,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的变化并不受亏损公司的“洗大澡”行为的影响。

(三) 敏感性分析

Qiang(2007)在选取样本时,只保留了在估计期和样本期内所有年份均处于上市状态的公司。因此,为了剔除新纳入样本的公司观测值对非条件稳健性实证结果的影响,在本部分笔者也只保留1993—2007年内所有年份均处于上市状态的公司。新样本只包含100家公司和900个观测值。使用新样本的数据对模型(1)和模型(2)重新进行回归,没有发现实证结果与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结果有显著差异。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以1999—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进行研究,主要检验了1999—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系统中是否存在非条件稳健性,以及我国2001年和2007年两次会计

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对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1999—200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会计中存在非条件稳健性。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来的非条件稳健性不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第二,2001年的会计制度变更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条件稳健性水平。至于2007年的会计制度的变更是否降低了非条件稳健性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旭东,黄登仕.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时序演进与行业特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6(04):59—65.
- [2] 贾瑞芳.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稳健性角度[D].中山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8.
- [3] Barth Mary E., Landsman Wayne R., Lang Mark H., Williams C.. Accounting quality: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US GAAP[J]. 2006. Working paper.
- [4] Basu 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24: 3—38.
- [5] Beaver W. H., Ryan S. G.. Biases and lags in book value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ability of the book-to-market ratio to predict book return on equ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38: 127—148.
- [6] Beaver W. H., Ryan S. G..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Concepts and modeling[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5, (10): 269—309.
- [7] Lobo G. J., Zhou J.. Did conservatism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ncrease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Initial evidence[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6. 20(March): 57—73.
- [8] Qiang X.. The effects of contracting, litigation, regulation, and tax costs on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cross-sectional evidence at the firm level[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3): 759—797.
- [9] Riedl E.. An Examina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03): 823—852.
- [10] Watts, R.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ccounting Horizons[J], 2003, 17(03): 207—221.

[作者简介]黄文(1975—),男,湖北荆州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王晶(1983—),女,河北唐山人,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收稿日期]2011-02-18

责编:黄晓梅;校对:芙蓉